

1

緒論 方法的智識化

傳統上認為：研究應遵循科學方法來創造真實、客觀的知識。藉由看來像是資料、事實，或被呈現為資料、事實之物，亦即「真實」(reality)的明確軌跡，我們得以藉由以經驗作為根基的結論，取得合理的適當基礎，並進一步將結論通則化及建立理論。正因此事長久以來被認為如此，難怪在社會科學裡的許多經驗導向的研究者，仍將此奉為圭臬，也不管自己是在處理「客觀真實」(社會事實)，還是在探索互為主體性的經驗世界(意義)。

然而，上述觀點也已受到許多批評，且多數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末出現，並直接針對「實證論」(positivism)而來。但自此之後，卻產生更多針對質性方法之不同變體的批判，這些變體有時自動被視為「反實證主義立場」，或至少是「非實證主義立場」。目前，我們只會提及，強調語言具歧義性、變動性和依情境而定的特質，觀察和資料都必須根據詮釋和理論才能進行理解(原則上，並沒有所謂無需詮釋或不受理論引導的事實存在)，以及社會科學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型態等諸如此類的批評。此處的論證之一，是來自於知識無法與認知者分離的想法(Steedman, 1991: 53)。誠如我們將論證的，資料與事實是詮釋

的建構或結果：如果資料或事實要能讓人理解和產生意義，我們就得用自己的感覺意念做點什麼才行。伴隨著對客觀科學觀點以及過度強調經驗資料的一般批評，更特定的批判的出現，則是爲了反駁各種方法論上的思考過程(conceptions)和方法。若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思考過程和方法，已遭受一連串的反對，那麼人們可能會期待經驗主義者失去自信，並另行思索調換到一些其他的研究分支^①。但事實上，這似乎產生巨大的風險，這些正在從事研究的研究者仍堅持舊有路線，若不是全然鎮壓批判，就是仍或多或少未意識到批判。另一方面，許多批判者傾向走入另一個極端，並全然拋棄經驗上的真實——雖然他們要如何準確地拋棄經驗真實，是根據他們特定的科學取向而定。

在社會科學(本書大體上限定在此範圍)採取經驗導向的大量主流研究，與在不同哲學和理論基礎上批判「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各種當代研究之間，有著清楚的區隔。就某種程度來說，這個區隔與學者之間的二分法重疊，亦即有學者採取堅實且客觀的本體論取徑；另有學者則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採取意識與經驗導向及詮釋的觀點(Burrell and Morgan, 1979)。當然，兩種區隔之間仍有某些差異，因爲某些第二種取徑的某些代表性學者，已被吸引到經驗主義的陣營之中——比方說，一些現象學者和其他嚴格的質性方法倡導者，就假定倘若我們在方法上確實嚴守分際，將能確保好的研究結果。經驗主義的

^① 「經驗主義者」(empiricists)指的是在科學領域工作的那些人，他們深信經驗研究能直接反映真實的能力，以及「資料」在科學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主要被視為是收集、處理和分析資料的問題，不管是量化還是質性。理論和資料被認為是不容置疑地分離，理論的價值就建立在對抗或擺脫資料上。

批判者(從科學史學家、知識社會學家、科學心理學家和語言學者，到意識型態的批判者及哲學家)宣稱文化、語言、選擇性理解、認知的主觀形式、社會習俗、政治、意識型態、權力和敘事，全都以一種複雜的方式，滲透到科學活動之中。這些元素影響了經驗真實，與(或)嘗試將真實的片段，強行置入研究文本中，導致「真實」與「文本」(研究結果)之間的關係，最好的狀況就是難以預測，最慘的狀況就是兩者關係是獨斷的，甚至不存在著關係。下述是此主題的許多變種之一：「指派十個不同研究者探索一個一模一樣、具備同等重要性的研究問題，你將得到十種不同結果(故事)。」(結果或故事不必然相互矛盾，但要我猜的話，彼此經常會有模稜兩可的關係)^②。若欲支持這個論點，我們只需想想，儘管在社會科學中的多數領域裡，存在著不同理論的豐富性，但經驗結果卻通常是(或至少部分是)「同意」研究者自己的前提，而且只要其他理論背景的研究者，秀出與自己觀點相左的經驗「資料」，多數研究者似乎就會傾向於改變自己的觀點。

本書將檢視有關社會真實如何被研究者建構(不只是如何被再現)的各種觀點。帶著反經驗主義立場的我們相信，經驗的社會科學遠不如普通常識，或傳統方法論教科書裡讓我們以為的那麼確定，也存在著更多問題。在這一點上，以「質性方法」為名的大量書籍，並未與量化文獻有著決定性的差別。一般來說，就經驗材料的歧義性，與詮釋複雜性是否足夠開放的意義上來說，那些以質性方法為名的書籍也「不夠質性」。將重點放在程序和技術上，意味著仿效量化方法論教科書，並忽視研究

^② 即使在狹隘領域中的量化研究，也通常會指向不同方向。比方說，在領導領域中的大量研究，並未出現一致或明確的結果 (Andriessen and Drenth, 1984; Yukl, 1989)。

工作中的某些根本問題，諸如語言所扮演的角色、詮釋性和選擇性，因此也低估了反思的需要。另一方面，過度強調這個需要，也會有特定的風險產生，因為在提出研究問題時，我們可能高估了困難度，長久下來將造成失敗主義者的反應，也許甚至會問自己，經驗的社會科學究竟是否還有任何合用的功能。

然而，我們不會輕易放棄，儘管我們試圖考量關於經驗材料(資料)能否提供重要輸入到研究中的這個疑問。我們也無法被說服，方法論教科書裡的知識所提供的另一極端(比方說宣稱在後現代或後結構主義的精神下，經驗真實可以被全然忽略)必然是比較好的。我們也不建議，應該對具有更多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特徵的經驗事物感到恐懼。我們的經驗是，在一個令人困擾且互相矛盾的研究生中，令人驚奇且有啟發性的經驗材料通常十分有看頭。我們相信，正是來自科學哲學的啟發，與經驗興趣的兩相結合，提供了本書的**存在價值**，也讓本書與眾不同。在相關領域中的大部分文獻(廣義來說，就是關於如何從事良好社會科學研究的想法)如果不是經驗導向，就是讓理論與哲學考量擁有明確的優先性，進而傾向讓經驗研究看來古怪、不相干、天真，或甚至是低能的。我們反而試著在這兩個傳統(且安全)的立場間移動，在我們看來，這反而有點像是在方法論上腹背受敵。

當我們處理經驗主義時(在此，廣義來說，就是把「單純資料」或未詮釋的「事實」，視為研究堅實基礎的所有研究)我們試著考量反對意見，包含詮釋學者、批判理論者、後結構主義者、語言哲學家、論述分析者、女性主義者、建構主義者、反思主義者，以及其他讓不管是量化或是主流質性研究支持者生活更困苦的找麻煩者。相對於這些找麻煩的人——明確或含蓄地讓他們的讀者，在面對經驗研究時感到絕望且躊躇不定——我們堅稱，若超越研究者的自我中心，和研究社群的

民族優越感(典範、意識、文本、修辭上的謀略)而假定真實的存在，那在實際效用就會更有收穫，而且身為研究者的我們，也應該能夠就這個真實，講出一些有見地的東西。這個要求與社會真實並非外於人——社會的成員和研究者(當然也是社會成員)——的意識和語言的這個信念一致。

質性與量化方法

誠如上述，雖然我們主要處理質性方法，但我們卻用有點非正統的方式在進行。「質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應該被如何定義，絕對不是不證自明的。對開放、模稜兩可的經驗材料進行考量，並將重心放在上面，就是重要的判斷標準，雖然有些質性研究方法仍十分強調分類的重要性。因此，標準化與非標準化之間的分際，就像量化與質性方法的界線，變得稍稍模糊，但並未讓它變得毫無用處。質性方法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他們從被研究主體的觀點和行動著手，而量化研究對哪些面向和範疇構成重心，則經常出自研究者的想法(Bryman, 1989)^③。我們並不是清楚地站在偏好質性方法或反對量化方法的立場上討論，即使我們顯然對社會科學中，普遍採用量化方法(至少就多數的嚴格定義形式來說)感到高度懷疑。但這沒有理由成爲一個正當化質性方法存在的特殊論點，而且現在大部分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已妥當建立質性方法論，甚至在一些領

^③ 對大部分此類研究來說，質性研究的特徵是有效的。然而，一些語言和實踐導向的質性研究，並未對主體的意義或觀點具備興趣(Silverman, 1993)。質性研究因而「變得比較像是經由文本被產製出來後，去分析論述主題的起源、本質和架構的問題，而不太像是在決定，對思考主體而言，文本和文本的摘要究竟為何物的問題」(Prior, 1997: 66)。

域中已佔主導地位(參照 Denzin and Lincoln, 1994; Silverman, 1985)。

因此，我們將不再就量化與質性方法的優劣，作更進一步的討論，這是許多辯論已探討過的主題且常常無功而返(Deetz, 1996)。然而，這個辯論看來已接近尾聲，部分是因為爭論已走向枯燥乏味；部分是因為在有關方法的討論上，極化似乎已不再像以前那麼受歡迎(例如參見 Bryman, 1989; Martin, 1990a; Silverman, 1985)。一般認為，量化與質性方法之間的選擇，無法在理論上達成，而是必須與特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有關。雖然就我們的想法來看，情況不像今天所稱的那麼普遍，但有時純粹的量化方法可能較適當，有時單單使用質性方法會較適當，有時則是結合兩者才適當(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④。即使是以質性研究為主的例子中，有時納入一些簡單的量化，也可能是明智的選擇(Gherardi and Turner, 1987; Silverman, 1985)。雖然社會現象的統計，通常會包含歧義性，並隱藏了分類所植基的社會規範(Prior, 1997)，然而，當他們在質性研究中被當成背景材料時，有時也具有某種價值。

在我們的想法裡，好的社會科學的決定因素不是方法，而是本體論與知識論。當論及詮釋的可能性時，這些面向通常會在質性研究中被處理得更好，質性研究允許歧義性，並讓研究

④ 有個觀點認為，問題必須要先被確定，然後才是方法。這若是拿來充當技術導向研究的平衡機制(比方說，問卷或半結構式訪談被認為是所有問題的解決之道)會是合理的，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研究問題無法獨立於知識論及理論的基礎點之外而決定。廣義來說，建立一個有趣且可處理的研究問題，根據的是方法論問題上的基本主場。兩者互相影響的雙向關係，比起由方法(與方法論問題上的理論考量)這一邊，或由問題那一邊來主導的單邊關係，要來得更為合理。

者對探索事物的建構變得更清晰可辨——但也有量化方法的運用案例，不會讓圖表、技術與客觀性宣稱握有優勢，反而會退居在設想周到的整體研究觀點之後(其中例子：Bourdieu, 1984; Silverman, 1985)。假如我們可以避免掉入將量化結果視為堅實且清楚反映「就在那裡」(out there)的真實的陷阱之中，那就沒有理由偏激地「反量化」(anti-quantitative)。

二、反思 / 反身性研究

與其說是在談論時偏好質性方法，不如說本書的意圖是想對我們所稱的「反思或反身性經驗研究」(reflective or reflexive empirical research)作出貢獻(目前，我們使用這兩個概念來表達相同的意義，研究者有時用類似的方法在使用它們，之後，我們會作出區分，將反身性視為反思研究中的一種特別、特定版本，包含對多種層面或應用在多種主題上的反思)。這是什麼意思？根據布迪厄與華康德(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的說法，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反身性，其中包含作為文本的現象學民族誌、(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後現代社會學、批判現象學，以及諸如古德納(Gouldner)與紀登思(Giddens)等作者的作品(雙重詮釋)。布迪厄自己的變種——研究者被嵌進社會場域之中，並以競爭和權力狀況的特定關係，在參與者之間產生一種特殊的「習癖」(habitus)，亦即行動傾向的模式——也屬於其中一種。

因此，反身性或反思在文獻中有不同用法，一般說來，反思會去關注，知識產製過程與這些過程的各種脈絡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知識產製者的參與，其中至少對研究工作產生兩種層面的作用，與更關注人如何去考量思考(think about think-

ing)(Maranhão, 1991)。葛拉絲與史米爾西屈(Calás and Smircich, 1992b: 240)指出：「反身性是不斷評量『知識』與『處理知識方法』之間的關係」。簡言之，對我們而言，這個概念(我們將在下面章節探討)意味著在處理知識發展的過程中，亦即在經驗材料被建構、詮釋和寫作的時候，必須嚴肅關注不同類型的語言、社會、政治和理論元素，彼此如何糾結在一起。反思模式的經驗研究，起於質疑那些在表面觀察下，看似可對真實運作方式進行毫無疑問複製的一種取徑，但同時又維持著一個信念，意即從這個真實之中進行適當(設想周全)擷取的研究，可為知識產製提供一個重要的基礎，進而開啓(而非關閉)並提供理解的機會，而不是去建立「真相」(truths)。

反思研究有兩個基本的特徵：謹慎詮釋和反思^⑤。第一個特徵意味著，任何對經驗資料的參酌(不論重要與否)都是**詮釋的結果**(results of interpretation)。因此，認為測量、觀察、訪談對象的陳述、和次級資料的研究，比方說統計或檔案資料，都與經驗材料之外的任何東西，有著毫不含糊(unequivocal)且毫無疑問的關聯，這個想法在原則上應被駁斥。考量詮釋的基本重要性意味著，認為「真實」或「經驗事實」與研究結果(文本)之間的關係，有著簡單對應主題的預設也應被駁斥。詮釋進到研究工作的最前線，且要對理論預設以及語言和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重要性，給予最多關注，因為這些全都是組成詮釋的主要決定因素。第二個元素即反思，將注意「內」(inward)轉到研究者個人、相關的研究社群、被視為一個整體

^⑤ 我們可以推論，所有研究(大體上其實就是人類生活)的特點就是詮釋和反思。多數的方法論書籍中，包含質性方法，這些面向並不突出，詮釋通常被當成有限的元素，在資料被收集與分類之後才會出現。反思則極少被提及，且通常限定在技術上的問題，以及跟結論有關。

的社會、智識和文化傳統，以及語言和敘事(表達的形式)在研究脈絡中的核心重要性，與有問題的本質上。在不同層面上進行系統性的反思，可以賦予詮釋具有讓經驗研究有價值的特質。在經驗研究的脈絡下，反思可以被定義為詮釋的詮釋(interpretation of interpretation)，以及就經驗材料(包含它的建構)的自我詮釋，和進行批判性自我探索的起點(launching)。反思意味著我們在詮釋工作之中或之後，不斷地考量各種基本面向，經此作法，詮釋才能被正當化。在本書的章節中，我們將指出一些反思的層面和原則，我們所掌握的層面和原則，可以融合到經驗研究之中，並激發它。

因此，在反思的經驗研究之中，重心從經驗材料的處理，盡可能轉移到知覺、認知、理論、語言、文本(互涉)(inter)、政治與文化環境的考量上，這些考量形塑出詮釋的背景，同時也滲透到詮釋之中。這些情況讓詮釋變得可能，但在不同程度上也意味著，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天真且無意識的任務。比方說，對研究者而言，要釐清在他們自己的社會文化、研究社群和語言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預設和盲點，若非明顯不可能的話，就會極為困難。因此，我們取徑的主要目標就是，在質性研究的一開始，就要試著去激發批判性的反思和察覺性^⑥。經驗素材(參照「真實」而來的詮釋)仍然十分重要，但在形塑諸

^⑥ 然而，我們必須說的內容(若非全部也是大部分)，也與量化研究有關。事實上，我們所作的許多批評，在更大程度上會涉及到量化方法，比方採用天真的語言觀點，而這兩種取向之間的界線也並非總是如此清楚明白。然而，在本書中，我們不會處理何者是特別針對量化方法的問題，反而會參照質性方法領域中的文獻，並處理與這個領域特別相關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反思研究，與知識主體可以避開所有批判性檢視的研究，兩者之間的區別，比量化與質性研究之間的區分，還來得更為有趣，因為它「是以方法論上的理由所建立而成的」(Kittang, 1977: 33)。

如此類對「真實」的任何意見之前，我們必須帶著謹慎和反思來處理，並更加仔細思量，經驗材料指的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我們正好作出這種特定的詮釋。研究過程構成對社會真實的(再)建構，在社會真實中，研究者同時與被研究的主體互動並主動詮釋，並且不斷為自身和他人建立形象，而形象則選擇性強調關於狀況和過程(指經驗、處境、關係)如何能被瞭解的特定宣稱，因此，也將壓迫到其他詮釋。本書的目標就是指出，研究工作的資料建構(詮釋)和文本產製(作者權)(authorship)的一些重要主題，並用這種方式來概念化這些主題，以激發察覺性並提供在研究過程中的規劃、詮釋和寫作上，具備謹慎和反思的想法。

當然，這是個有企圖心的目標。在讀者開始對我們產生全能的幻想之前，我們也許應該進一步說明，本書當然不是從頭開始。從根本上來看，本書是(社會)科學哲學知識狀態的一份清單和批判性回顧，特別是與社會研究、質性方法有關。對我們而言，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強。然而，我們將試圖超越簡單的清單列表和綜合性討論。我們也希望能夠表達不同立場的批判，嘗試達成整合及發展應用形式，最重要的是，透過發展一個能在處理反思元素時，彈性十足且機動的參考框架，以提出從事社會研究的新方法。

過度哲學導向的討論仍與經驗工作脫離。許多研究者可能感覺類似梅麗亞(Melia, 1997: 29)所說的：「研究者所從事的，跟他們打算用來正當化研究方法的哲學立場之間的連結，通常都很有問題」。我們同意，這種情況的確時常發生，當然也讓人感到很不滿意。提到哲學思想卻沒有真正運用它，將是沒有意義、令人困惑，且意味著浪費研究者，以及他或她的倒楣讀者的時間和精力。哲學思想和經驗工作的相互作用，標示著高

品質的社會研究。雖然說哲學素養必然不是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但缺乏富有哲學知識反思的社會研究，卻容易發展成非常草率的研究，致使「研究」這個標記變得令人質疑。要避免方法論被視為研究實踐中次要的事，而成為被「智識化」(intellectualized)的結果，這必然是種挑戰。為了反駁「當方法上的辯論變得更哲學，或至少是更具知識論性質時，他們對從事研究來說就變得更無用處」(Melia, 1997: 35)這種看法，我們希望對此類有用的辯論作出貢獻。這個用處(usefulness)將因哲學——理論思想、以及來自經驗——實踐所啟發的靈感之間有個更好的交互作用，而引出能避免某些陷阱，及更具反思性和創意的研究。

三、反思研究的四個元素

第二章到第五章處理方法論與科學哲學的四個當代思潮(currents)，我們認為這四個當代思潮是靈感的重要來源，包含經驗導向的當代思潮(特別是紮根理論)、詮釋學、批判理論及後現代主義。不論社會科學研究者偏好何種特定方法，這四個取向(orientations)都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致力其中的反思領域。在這一點上，我們樂於就我們出自不同取向的主要貢獻，作一簡單描述，並透露一些接下來將討論的內容。

1. 研究程序中的分類系統與技術(systematic and techniques in research procedures)：與經驗材料互動時，質性研究應該遵循一些充份論證的邏輯，並使用嚴格的技術來處理資料，這是多數質性方法書籍談論的內容。我們以紮根理論(Glaser and Strauss, 1967)為這個方法論觀點的典型

範例，我們也將簡要地提及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和歸納的民族誌(inductive ethnography)。

2. 詮釋首要性的釐清(clarification of the primacy of interpretation)：對照其他活動來說(或至少在更大程度上)我們應該意識到一個事實，意即研究可被視為一種基本上就在作詮釋的活動。認同所有研究工作都包含詮釋者 而且是在社會科學中，經常與其他詮釋者(被研究者)互動，並注視他們的人 並由詮釋者所推動，提供了合格的方法論觀點的關鍵。因此，方法無法擺脫理論與前理解的其他元素，因為預設和想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決定了研究客體的詮釋和再現，所以詮釋學是反思的重要形式。
3. 研究的政治 – 意識型態特質的察覺(awareness of political-ideological character of research)：社會科學是嵌在政治與道德情境中的社會現象，要探索的東西為何，以及如何探索它，都難以避免支持(再生產)或挑戰既存的社會狀況。被偏好或不偏好的不同社會旨趣，取決於被提問(或不被提問)的問題，以及真實如何被再現和詮釋。因此，詮釋與詮釋所植基的理論預設並非中立，而是政治和意識型態狀況的一部分，這也協助建構了上述狀況。這些面向會被強調出來，尤其是批判理論學家的看法。
4. 關於再現與作者權問題的反思(refle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and authority)：最近的詮釋學已經指出，文本以許多決定性的方式跟作者分離，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更往前一步，將文本與任何外在真實分離。文本可說是具有自己的生命，並缺乏任何外於自

己本身的參照。文本只會彼此影響，混亂的雙向影響所造成的加乘後果，讓文本變得不完整而破碎。這樣一來，作者(或是我們現在所談的研究者)對作者權的宣稱，與本文再生產(更不用說是「鏡射」)一些外在真實的宣稱，兩者都同樣遭到破壞：研究主體與被研究主體也同時受到質疑。

讀者或許會把此處介紹的四種主題所連結的不同理論立場，視為是不可共量性的(incommensurable)。至少在一些例子裡，他們確實如此。然而，設想出可以重新詮釋取自於一個以上立場的重要想法的研究策略，並將策略放到新的脈絡中，將是有可能的。無可否認地，我們提的四個取向之間有著可觀的差異，但此處重點不是整合具代表性的研究，比方說整合紮根理論和後現代主義，而是試著採取一種讓質性研究更具反身性特質，也同時強調經驗材料重要性的觀點，從詮釋學、批判理論與後現代主義中，提煉出原則和想法。在其他三個取向中，強調經驗材料重要性的觀點，經常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但對紮根理論和民族方法學而言卻極為關鍵，所以他們研究程序中的某些想法可能有用。因此，我們對於去詮釋從不同立場，而不是出自關於這些思想學派的正統態度，所搜集而來的某些洞見感到興趣，他們對社會科學研究可能具有通用價值。

若以此處所列順序為準，反思的這四種領域(反思的元素在第一種，也就是紮根理論這個領域中未受足夠重視)提供了某種邏輯。對(非標準化的)經驗材料的興趣，再現了(多種不同的)質性方法(比方說紮根理論)的核心要素，構成了研究工作的某種底線，然而，這個底線比一般所設想的還更不穩定。在多

數質性方法論的理論中，「資料收集與處理」的重點都未經反思且應受抨擊，反而是基本詮釋學的元素，從頭到尾都滲透在研究過程之中，因此，在所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對真實作出詮釋而非再現真實，就成為關鍵元素。甚至更強烈來說，根本沒有什麼未經中介的資料或事實，這些通常都是詮釋的結果。但詮釋並非在中立、去政治和無關意識型態的空間中出現，也不是由一個自主且無價值判斷的研究者負責。不同的典範、觀點和概念，以及研究與其他政治興趣，都會產出詮釋可能性的某種類型，通常在中立、理性、正當與正確的外表下，就同時壓迫了其他可能性。那麼，詮釋作為一種政治－意識的表達，就再現了對於詮釋的詮釋學分支的一種重要補充，懷疑的元素因此會被導入。這讓人理解即使是在意識型態與政治上有所察覺的研究者，也冒著被自己的文本產製所引導的風險，因為在文本產製中，普遍且自由來去的論述的影響力會佔上風，並用著刻意參照且恐怕在政治上有所察覺的文本，來耍弄自己的不完整遊戲。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企圖想要判定「事情就是這樣」或「這就是詮釋現象的最好方法」，將可能被視為一種幻想且注定面臨失敗。這個想法引發出，研究者對作者權的宣稱也變成是個問題。

在這些初步考量的基礎，與本書中後續將詳述的其他內容上，我們因而宣稱，優良的質性研究(其他研究亦同)應該建立在普遍的察覺，以及對上述立場和問題與他們所指出的可能性，具備系統性且清楚明白的處理方式之上，而這應如何處理，就是本書剩餘章節所欲探討的主題。在第七章中，我們將得出一個為反身性方法論所提的計畫，它圍繞在詮釋與反思的多層、彈性架構上，在此架構中，反思領域的系統性相互作用就是關鍵。

四、本書的編排

在第二章到第五章，我們將討論的反身性方法論中的四個主要層面。首先，我們會討論一個具有相當嚴格經驗導向的典型質性方法，亦即紮根理論。我們在紮根理論中，看見某些正面元素，但認為它帶給研究過程一個過於理性化的描繪，且表現出經驗研究的天真幼稚觀點。第三章到第五章處理這些能夠克服經驗導向研究中弱點的元素，如果這些元素可以被嚴肅對待，且應用到經驗研究計畫中的話，那麼超越這些元素並走向更為精巧的研究過程，亦即詮釋、政治—意識型態的觀點與文本的相對自主性，將有可能會實現。

在第六章中，我們描述與重新定向的質性方法，一些有著高度相關的、更為重要且影響主題的因素，儘管這些影響在上述反思工作的層面裡，是補充性質而不是組成反思工作的基本元素。其中包含論述分析(語言行動與表達的近距離經驗研究)、女性主義(性別研究)與系譜學的權力理論(例如傅柯)，這些論點進一步帶出第五章，甚至在某個程度上來說，是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的一些洞見，但也超越了這些章節中所處理的內容。

作為結論的第七章，主旨是爲了要爲質性方法開創一個不僅全新、更廣泛，而且可以開展的範圍，所以讓四個主要層面彼此正面遭逢——亦即經驗材料、詮釋、政治／意識型態，與再現／作者權的處理。在方法論的議題上，我們表明了建構我們想法的不同方式，並指出一些根據研究問題與認識旨趣，給予反思領域不同比重的反身性研究類型。我們也就處理研究過程複雜性的可能方法，提供一些具體提議，並討論與反身性元

素相關的企圖心所適用的層面。

本書文本預設讀者對學術上的社會科學有一些普遍認知，並精通某些質性方法和科學理論。除此之外，不需具備任何特定的舊有知識，應該都能閱讀本書。

我們不會解釋被視為普通知識的術語，對那些被特定字眼給絆住的讀者，一般的百科全書應該就能幫得上忙。然而，因研究導向及根據讀者先前對該領域的熟悉程度，書中部分內容可能相當吃力，但這只是恒心毅力的問題！不用功的話就沒有收穫，除了可能得到方法論上的垃圾食物之外，當下很滿足，最後卻換來營養失調……。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版已正式上市版本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此書有正式上市時能即時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